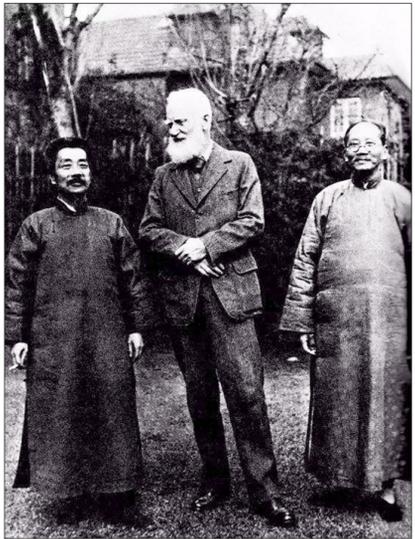


# 鲁迅看戏

1924年7月7日晚，忙了一天的鲁迅在北京西车站的食堂匆匆用餐，饭后他等13人登上开往西安的火车，开始了他们的西安之行。招待跟随他们的是陕西省驻北京的代表王捷三。自启程之日起至8月12日返京，前后共37天。往返路上花费14天，在西安的日子只有23天。鲁迅五次被邀前往西安易俗社，用五个晚上观看了五场大戏，享受秦腔秦韵。



鲁迅与萧伯纳

7月16日，是鲁迅到西安的第三天，晚上被邀请到西安易俗社看戏，演的是《双锦衣》前本，17日接着观看《双锦衣》后本。18日，午后下起了小雨，鲁迅乘雨后的凉意，同李济之、夏淳筠、孙伏园游市场、逛公园、茶馆小饮，吸吸雨后的清新空气，晚上有一部大戏《大孝传》全本等着他们。26日晚，应王捷三之邀赴易俗社观看《八月圆》。8月3日上午，鲁迅同夏淳筠、孙伏园去各处辞行，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并川资泉二百，下午青年会洗个澡，准备参加刘镇华省长的饯别宴会，又是在易俗社演剧行，最后再享受一次秦腔。

鲁迅这次西安之行，是受西北大学校长傅秉常之邀来讲学的，8天内有11讲，共12小时。观戏5场，以每场3小时计，共15小时。看戏的时间多于讲学，鲁迅有点不务正业了。从接待方来讲，可谓周到盛情，地方特色、地主情谊，让鲁迅美美地“享受”了一番。

身在异乡为异客，鲁迅愿意这样的招待，喜欢这样的接待，享受如此礼仪，心慕如此场面，恐怕不会。鲁迅处在被动的地位，客随主便，不得已而应之。首先是身体条件的不允许，鲁迅身体一直有恙，来西安的途中，多次腹泻，“服药两次十四粒”勉强坚持达目的地。西安的暑期，酷热难耐，每次讲课只能讲1小时。7月23日，“晚与五六同人出校散步，践破鞋，失足仆地，伤右膝，遂中止，于伤处涂碘酒。”25日，“午后盛热，饮苦南酒而睡。”有时处在小暑状态，浑身不适，头晕脑胀。如此身况，何以坐观三小时，处浊室听噪音，是何等难熬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是水土的孝子，从水土里走出去的人，他永远

属于水土，不管他走多远，外居多久，他永远离不开水土，永远是水土的一分子。说乡话，喜乡音，爱吃乡饭，嗜好乡戏。人生的所享所爱，就是对乡音、乡食、乡俗、乡戏的习惯适应和满足。鲁迅是南方人，在越剧之乡长大，从小耳濡目染，受越剧熏陶，如果说文化享受，莫过于美美地观赏一场越剧。至于其他剧种，对于他来说，听不懂看不明，就谈不上享受了，不受罪就不错了，秦腔更是如此。同鲁迅观戏的浙江绍兴籍同乡孙伏园回忆说：“说实话，我对秦腔唱词听不太懂，那时又没有打字幕的办法，所以听起来较费劲。”后我遇浙籍同事，问他来秦地可曾欣赏秦腔，他说享受不了，满场都是“我——我——我——”听得头大。南人听北戏，北人听南戏，概莫能外。此时的鲁迅，被前后左右的人夹在其中，动弹不得，不能说话，洗耳恭听，洗目观看。幕出幕进，狂吼乱叫，如雷贯耳，青筋暴露，声嘶力竭，这是干什么呢，一脸茫然。

地域文化，地方戏曲，方言特色，虽有文明的内涵，是文化的标志，是人们的享受与娱乐，但仅限于地域内的人群。地域人群是地域文化的传播者和骄傲者。相反，异域他族则是

抵制者，这是自然形成的文化冲突与对抗。鲁迅是文化学者、文明使者，他有领略和了解甚或体验地域文化的责任和使命，但他无法排除地域属性，也就是无法立即由欣赏越剧剧改为欣赏秦腔。尽管表面可以做到对对方的服从，对地主、朋友、领导所安排的尊重和感激，但无法去除此内心的难受和难堪。洪焯在《周作人与八道湾》一文中说：“那时候周作人已适应北京的生活，也不再挑剔北京的茶食之类了，和正宗的老北京唯一的区别恐怕在于，拒绝看京剧。”文化的适应更难以物质的适应，作为同样听着绍兴戏长大，做了八道湾主人的鲁迅，尽管兄弟二人有千差万别，但在文化适应这一点上恐怕是相同的。这并不是他们的保守排外，实在是环境的熏陶，时间的雕刻。

1919年11月，教育部专门成立了国歌研究会，审听国歌。鲁迅被指派为干事，多次参加听音乐会。有一次在教育部礼堂听唱，蔡元培与鲁迅同座，鲁迅对蔡元培说：“我完全不懂音乐。”蔡元培就怀疑，他是否对官方指定他这个音乐外行来审定音乐表示不满。多次听审会，“不同场所陪同审听，把鲁迅听得都快疯了”（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可见，听音乐，哪怕是戏曲音乐，对鲁迅来说都是不轻的难受或刺激，秦腔就更不用说了。

感情的场面和自我的感觉，热情的招待和内心的感受，有时是相背的，感情之下的难受难堪更令人尴尬，鲁迅大概在这样的尴尬境地，为什么呢？要么热情退却，要么受者却步，这是两者都不愿看到的。鲁迅何必受这罪呢，退却拉倒，打个招呼或托词一下，也就免受其苦了。从礼节上讲，礼招的首场，不得不应付一下，省长的告别饯行戏不可缺席，中间的三场就免了，情理上也说得过去。但鲁迅大概想，不得如此无礼，人家盛情，我们怎能冷却。我们受点难事小，伤人面子事大。宁受五场苦，不伤朋友面。所谓鲁迅的冷漠、残酷、不近人情，看来都是不实之词。 □焦仁贵

### 钩沉

## 「当代愚公」刘西有的精神高地

人民日报著名女记者金凤先生在《当代愚公——刘西有和他的伙伴们》一文里这样写道：“我们站在马莲台的高坡上，看着马莲台几十间新盖的青砖瓦房，看着那从石皮崖上打出的层层如画的梯田，看着那满山坡的松柏桃李，回顾着刘西有和他的伙伴们十多年来走过的战斗道路，感动和振奋的情绪，如波涛起伏，久久难以平复。但是，刘西有对于未来的道路，对于彻底改变马莲台面貌的思想更多更远。他牵着儿子的小脸，眯着双眼笑着说：我干不完的事，娃要接着干下去！孩子的小脸笑开了，笑得比盛开的桃花还更鲜艳漂亮！”

之后的几十年，每当读着上述这段饱含深情的文字，不由得我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因为，该文中提到的孩子便是我，商洛山里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

能与《人民日报》结缘，完全得益于父亲艰苦创业的“愚公”精神。

1950年早春的一天晚上，从乡政府开会回来的父亲浑身是劲，他牢记区委书记教他的话“人穷心红，走在头里”，把村里的几户穷苦百姓召集到家里，在如豆的煤油灯下，讲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的惶惶日子，如今我们翻身当家作主了，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党中央提出“组织起来，由穷变富”的号召，我们应该积极响应，立志拔去穷根。父亲的一番讲解，犹如暗夜里的一束蓝色火焰，点燃了大伙的激情。鸡叫时分，穷怕了的8个人16只拳头紧紧握在一起，不拔穷根誓不罢休！就这样，一个由8个光棍组成的变工队诞生了。

人凭络起来了，却没有一把像样的工具。听说在离家百余里外的赵川，有个铁矿可以用背矿石来换生铁。为不影响春耕生产，父亲当即与伯父冒着料峭的春寒，徒步来到了铁矿上，经过十余天起早贪黑的苦苦煎熬，换回了87斤生铁。回到村里后，没钱雇不起铁匠，父亲采取同样的换工方法，终于打成了12把牙齿钎。正值春耕生产大忙时节，父亲带领着变工队成员，肩扛着崭新的铁钎，辗转在村前村后的山山峁峁、沟沟岔岔，开始了向荒山“要粮要钱”的战斗。面对当地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自然条件，父亲大胆地提出“要给高山松林戴帽，要让低山经济林缠腰，要在山底梯田环绕”的构

想。通过变工队、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一步过渡，他们一步一个脚印，用了近八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这一构想，解决了多年来困扰群众无粮吃、无钱花、无柴烧的三无问题，让一穷二白的山沟沟面貌焕然一新。

1958年12月，适逢国庆10周年前夕，全国各行各业群英会在北京召开，父亲作为农业战线的代表，荣幸出席了这一盛会，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总理为父亲所在的马炉生产大队颁发了国务院奖状，他本人也成了闻名西北的全国劳模。

受表彰奖励后的父亲干劲倍增，对改善家乡贫困面貌更是充满了信心。他从北京一回到马炉，就积极带领群众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修筑梯田。第一次在信虎崖凿渠引水，确保了30多亩土地的旱涝保收；第一次打通了山柴莫不能人工育苗栽培的神话，通过人畜粪便浸泡办法，让其大面积种植推广；第一次治理了荒无人烟、水土流失严重的康沟，让祖辈人吃到了小麦。这一个一个，轰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时隔一年后的1962年春，金凤女士辗转千里，从首都北京来到了陕西秦岭南麓的丹凤县，一个丹江南岸的小山村。在这里经过一周的实地采访，她耳闻目睹了刘西有和他的伙伴们的精神风貌，以及村里天翻地覆的变化，感动之余，即创作了《当代愚公——刘西有和他的伙伴们》的通讯，全面、客观地介绍了父亲和他的伙伴们艰苦创业的感人故事。之后，这篇通讯被全文刊发在当年5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著名编辑苏宜先生为该文配发了评论文章《愚公移山》，高度评价了父亲与他伙伴们的愚公移山精神，从此，父亲与马炉大队在全国家喻户晓。

数十年来，我以父亲的“愚公精神”为楷模，以《人民日报》为荣耀，时时激励自己在工作、生活中踏实干事，清白做人，因为它早已烙进了我的灵魂深处，成了心目中的精神高地。尤其是爱上写作之后，更是把《人民日报》当成仰望的高山，每每品味着大地副刊上那一篇篇充满着温度与高度、灵气与地气的文字佳看，时不时地拷问自己，父亲以他艰苦创业的“愚公精神”越上了这一高山，我为何不能以辛勤的笔耕来攀登这一高山呢？回想起父亲他们那代人，为改

善家乡的贫穷面貌而不惜流血流汗，为家乡的百姓能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而不惜积劳成疾奉献生命，作为这种精神的传人，我坚信：只要怀着一颗敬畏、感恩、执着的心，就没有攀登不了的高山！ □刘丹影

### 往事

→图中佩戴奖章的人就是我的父亲刘西有(右二)



## 女兵作家谢冰莹在西安

家、艺术家、社会贤达、名流，真正让人眼前一亮，可谓一个超豪华阵容。

主编谢冰莹还很注意发现培养文学青年，在刊物上特设“青年园地”和“读者园地”，不拘一格发现人才。她说：“我们可以自慰，同时对得起读者的是培植青年作家，我们尽到了最大的责任。”尤其是《黄河》作家阵容中拥有一批充满青春朝气和创造活力的青年作家，从《黄河》这块文学园地走出而成名。谢冰莹说：“《黄河》月刊不应和一般刊物一样，只登一些小说、戏剧、诗歌之类的作品，而应该特别注重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这也形成了《黄河》的一个显著特色。”

谢冰莹的三哥谢国馨在1940年2月《黄河》创刊号代发刊词中写道：“看吧！奔腾豪放的水势！听吧！汹涌澎湃的涛声！这是黄河在抗战反攻的时候了！千千万万的战士在黄河两岸冒雪冲锋；千千万万的同胞在黄河流域引吭高歌！……怒吼吧，黄河！战斗吧，黄河！”这发刊词写得磅礴大气，气吞山河，给人一种血脉偾张的冲动！

《黄河》发表了不少抗战救国的作品，例如：文章《寇寇总崩溃前夕的晋南》《裸体杀敌的战士》《在黄河前线》等，戏曲《汉奸的跳舞》《穆兰花》《爆炸》《狂欢之夜》等，诗歌《太行山》《黄河颂》《北征之曲》《壮烈的五月》《血的季节》《战斗中的太行山》等。

《黄河》月刊设立“日本反战士文艺专号”，发表揭露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罪行的作品，这被称为一件史无前例的创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非同凡响的一页。堪称国内首创，世界罕见。表明《黄河》的视野开阔，思想深刻，意识超前，它应该是谢冰莹先生从人性角度出发，用日本反战士自省反思这一独特意义之举来审视战争。刊物还设立了纪念七七事变三周年的“七七专号”。

抗战时期，西安虽然诞生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救亡刊物，有些也办出了一定影响，但没有能够影响全国的顶级刊物。而《黄河》的创办，填补了这一空白。

值得大写一笔的就是《黄河》的主编

谢冰莹，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最有成就，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还被称为“女兵作家”。她年轻时投笔从戎，1926年，在女校读书的她，义无反顾，毅然投笔从戎，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先后两次征战沙场，在枪林弹雨中经受磨练。一次是作为女兵参加北伐战争；另一次是在抗战爆发后，她曾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奋不顾身奔赴前线，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参与伤病招待所工作。并被授予少将军衔，堪称巾帼不让须眉的近代“花木兰”。

谢冰莹记录自己1927年5月随叶挺师长率领的讨伐杨森、夏斗寅的革命军西征写下的成名作《从军日记》，作品一经发表，马上在文坛一炮走红，随之蜚声中外。这是她在紧张的行军打仗、宣传救护的间隙，抓住每一空闲时间，把自己亲历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而这些记录着血与火的作品，能够及时发表也很传奇。在战争期间，写好的稿子，非常难保存，因为她时时刻刻都存在着生命危险。于是，谢冰莹就将这些日记在行军转途中，遇到城镇有邮局的地方就立即寄给《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请他代为保存。这位1924年曾和鲁迅一起到过西安的孙伏园先生，被谢冰莹朴实无华、未经雕琢的日记所感动，认为她是一个女兵的独特视角，展示了一位新时代女性的思想和感情，她们从被封建锁链捆得紧紧的家里冲出，经过艰难痛苦地挣扎、奋斗，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投身救国救民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生活里，十分难得。孙先生以《从军日记》为题，将之在武汉的《中央日报》副刊上连载发表。还请来林语堂翻译成英文发表在报英文版上，紧接着法、俄、日、朝鲜等文的版本相继问世。于是，谢冰莹一举扬名中外。1930年8月，法国《小巴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参加中国革命的一个女孩子的》评论文章，详细介绍了《从军日记》。就连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也向谢冰莹致函，表达了他的

敬意和祝贺，赞扬她是“努力奋斗的新女性”，并告诉她“不要悲哀，不要消极，不要失望，人类终究是光明的，我们终会得到自由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亦称谢冰莹是女性的骄傲。

还有，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和《在日本狱中》，反映了她亲历战场硝烟的残酷血腥和陷入日本监狱受尽苦刑的铭心刻骨，都记得逼真而惊心动魄。其中日记体散文《在日本狱中》，就是1940年她到西安时创作出版的。

在西安的短短四年，她连续在建国书店出版了《抗战文选集》《姊妹》（短篇小说集），还在西安大东书局出版了《写给青年作家的信》等著作，近百万字，成为抗战时期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谢冰莹抗战时期活跃在西安的日子里，又编又写，在主编《黄河》月刊同时，还与沙雁等人负责编辑一个专为前线士兵阅读的文艺刊物《阵中文艺》。这些都

赢得了社会的高度赞赏，田汉、何香凝、黄炎培、柳亚子等许多名流纷纷赠诗。田汉写道：“谢家才调纵横，惯向枪林策杖行。应为江南添壮气，湖南新到女儿兵。”诗作很为传神，为我们勾勒出了谢冰莹的“女兵”特有风貌。

在西安，谢冰莹与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贾伊箴先生结婚。从此两人感情深厚，相依为命，白头偕老。她在《我的战时生活》等文中回忆：“1940年至1943年，我在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那一段生活紧张又令人兴奋，当时虽有路丁小姐帮着初审稿子，但具体的编辑、改稿、解答读者问题等，还得由我亲自来做，常常把稿子带到厨房去煮，一面拉风箱，一面看稿子；或者左手抱着孩子，右手写文章，还要和众多作家联系，为《黄河》组稿。这期间，我自己也编辑出版了《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姊妹》《梅子姑娘》《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及《在日本狱中》。”

江南才子卢冀野随国民参政会慰宣团到西北劳军，经西安到《黄河》月刊编辑部，有感于谢冰莹的办刊精神，遂写了一首诗相赠：“长安倦旅黄中行，香烟西渡女兵；号角诗筒同一吼，黄河从此怒涛生。”谢冰莹对卢冀野的诗艺水平，把时间（冬日雪）、地点（香烟园），和她的名字（女兵）及杂志《黄河》，一齐融在诗中，称此诗是“才子之作”，夸他才情横溢，是倚马可待的人物。

谢冰莹著作量惊人，一生出版的小说、散文、游记、书信等著作达八十余种，近四百部、二千多万字，一直写到八十多岁仍舍不得封笔，真正是生命不息，笔耕不止。

谢冰莹和冰心的原名谢婉莹就差一个字，冰心是笔名。又同是五四时期崛起的女作家，因了两个人的名字如此相似，一开头时就误以为她们是亲姊妹。其实这一对文坛“姊妹花”仅仅只见过一面，但一见而成知音，两人一直鱼雁传书，书信不断，甚至谢冰莹称冰心为“家姐”，冰心称谢冰莹为“舍妹”。冰心曾说过：“我和谢冰莹不是亲姊妹，而胜似亲姊妹。” □朱文杰

### 人物春秋



抗战时期，香米园德化里38号，曾是《黄河》月刊与新中国文化出版社的驻地。《陕西省志·报刊志》记载：“《黄河》月刊，系纯文艺性杂志，原系谢冰莹于1940年应新中国文化出版社聘来西安创办的文艺刊物。”

《黄河》大型月刊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也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相持阶段。立足西安，辐射全国，于是《黄河》大型月刊成了西北国统区开辟出的一片文化绿洲，激发了当地军民积极抗战的热情，还为西北文艺事业拓荒，形成了一支优秀的革命文学队伍。

《黄河》月刊16开本，用土纸和白报纸印刷。创刊第一年就印行5000册，第二年就达到12000册，最高时20000册。这在当时的动荡年月可是非常高的发行量了。是主编也是编务的谢冰莹曾感慨地说，在西北办刊确实不易。《黄河》的办刊之路异常艰难，坎坷曲折，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和局限。编刊之时，全由谢冰莹一手筹备，在她主持期间也基本靠她一人支撑。由于她20年代创下的名望和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她的敬业和无私奉献精神感召，才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围绕在《黄河》周围的作家群。

《黄河》月刊周围的作家群中耳熟能详的名家大腕柳亚子、老舍、丰子恺、孙伏园、梁实秋、碧野、臧克家、姚雪垠、牛汉，以及赵清阁、冯玉祥等，他们都在《黄河》月刊发表过文章。汇聚的这大批重量级的作

